

一个农民“导演”和他的20载“村晚”

“谁说农村泥腿子搞不好文艺？只要坚持用心钻研，办晚会咱也不比人家文化人差。”回忆着20年为黄川村“村晚”的付出与坚持，黄业江觉得一点都不后悔

“一方面村里的中老年人农闲时节比较空虚，需要丰富的文化生活；另一方面年轻人也可以借着这个平台，春节期间走出家门，在一起多聚聚，联络感情”



▲黄业江在“村晚”现场调试音响设备。



▲2006年，在黄川村“村晚”现场，村里一位老人也兴奋地登台表演。 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本报记者陆华东

时间每向农历2018年新年迈进一步，江苏省东海县农民黄业江的内心就愈发激动，脚步也更加匆忙。因为大年初一，黄业江自掏腰包，组织导演的“村晚”——黄川村新春联欢会将迎来20周年。

从1998年组织第一届黄川村“村晚”开始，每年年初一或者初二，黄业江都会如约为十里八乡的乡亲们办一场联欢会，请村民们上台表演，讲述村民自己的故事。

20年间，黄业江“导演”的“村晚”参与演员从10人发展到90人，观众从100多人达到高峰时的4000多人，黄川村“村晚”已成为远近闻名的文化名片。

当泥腿子爱上文艺

黄业江是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的农民。但他从小爱好文艺，喜欢接触新鲜玩意儿。

1998年，他从城里买了功放机和麦克风，邀请爱好唱歌的青年到他家中唱卡拉OK。

“虽然当时条件艰苦，设备简陋，但是大家却唱得很开心。”黄业江说，看大家这么喜欢，他动起了在村里办晚会的念头。“农村文化生活比较贫乏，农闲时村民们只能打牌消磨时间。希望春节期间，让更多人聚在一起唱歌，乐一乐。”

然而，没人相信他能真鼓捣出一场晚会。大家觉得那不过是个“玩笑”。

“咱农民一年到头干活，谁闲得没事听你唱歌呀？”

“农村这条件，文化人都没几个，怎么可能自己办晚会？”

对于黄业江的“疯狂想法”，父亲黄余先劝儿子趁早打消。但是黄业江却坚信村里喜爱文艺的人大有人在，不然不可能那么多人每天都大老远跑来和他一起唱歌，只是村里之前没人带头干这件事罢了。

1998年的黄业江只有28岁，小伙子倔强，“认准了的事情，困难再多，都要坚持下去”。黄业江说干就干，在当年大年初二办了第一届“村晚”。

“第一届‘村晚’，没有舞台，没有节目单，就是十几个人围着录音机唱歌，时间不限，唱几首都行。”回忆起1998年第一届“村晚”，黄业江评价“一点都不正规”。

但就是这么糙的节目，依然吸引了全村几百人前来观看。这坚定了黄业江继续办“村晚”的信心。

1999年，黄业江又在村中心路边上举办了第二届“村晚”。这一次明显“正规”很多——用4个挂车拼装出舞台，再找来一个拉板车斜靠在舞台上当梯子。节目也更加丰富，唱歌、相声、跳舞等，一共有十五六个。

节目多了，找演员成了新难题。虽然村里有不少人对文艺有兴趣，但对于登台表演，很多人起初还是“比较保守、紧张，不愿在大庭广众之下唱歌跳舞”。为此，黄业江挨家挨户找村民谈心，鼓励大家出节目。

“村晚”总导演

办“村晚”，还需要花钱。

话筒、功放、录像机、电脑、调音台、音箱、演出道具等，为了增加舞台效果，黄业江基本上每年都会花几千块钱添置一些新设备。

2000年办第三届“村晚”时，考虑到观众人数可能会很多，原先的两个小音响已经满足不了需求，黄业江狠下心来，花了1400元专门找人定制了一个大功率机。为此，他还专门赶到市区，等了两天两夜，才把功放机拉回来。

没有排练场地，黄业江就把演员们召集到自家院中排练，一练就是半个多月。有时排练太晚，他会请大家吃饭。为吸引更多参与表演，黄业江还自费买纪念品发给大家。

据黄业江粗略估计，20年“村晚”，他少说也已经贴了10多万元。“我不想谈这些，要是谈钱的话，这20年，乡亲们都是义务演出，我欠大家的演出费又何止十几万元。”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虽然“村晚”规模小，但是事情一点都不少。从最早的节目策划、演员报名，到后期的排练、开闭幕式主持词的撰写、舞台搭建、演员化妆、音响设备的调试等等，每一件事，都离不开黄业江这个“总导演”。每届“村晚”，他基本上前前后后都要忙一个月。

刚开始那几年，农村的磁带、光盘还不是普及，很多伴奏音乐在村里和镇上的商店都买不到，而且那时候也没网络，说下载就能下载，只能黄业江一趟趟地往县城、市区跑，给大家买伴奏磁带。

2001年办“村晚”时，下雪了，但是黄业江还是坚持演出。“老百姓都像过年一样盼着我们的演出，我们不能让大家盼兴。”最后，他和村民们一起找来竹竿，在舞台上撑着一大块雨布，坚持演出，吸引了大量村民冒雪前来观看。

为防止场地受到破坏，黄业江几乎年年三十的晚上都要去看舞台，守到天明。“以前没地方睡觉，我就睡在舞台底下的车厢里，后来我自己买了车，就把车停在旁边，我睡在车里，稍微暖和一些。”

有的演员虽然报名参加了节目，但是直到腊月二十九、三十才回来，黄业江就亲自开车去接他们。有一次下雪天，舞台上结了冰，黄业江赶在天亮之前，带着一把铁锹，跪在舞台上一点一点铲。等到天亮时，舞台已清理完毕，演出照常进行。

“每次演出结束后，别人都开开心心地回去了，他还得忙前忙后收拾，拆舞台、收音响、打扫卫生。”每每看到儿子为办“村晚”这么辛苦，父亲黄余先就特别心疼。

为吸引更多观看，黄业江在节目质量上也下足了功夫。

“年轻人喜欢流行歌曲，年纪大的人喜欢看戏，小孩子们喜欢看小品，小姑娘们对跳舞很着迷，不同人群都要照顾到。”黄业江说，他的节目单每年都会更新，而且节目一年比一年多，如今每年基本上都有20多个节目。

艰难坚持

上世纪90年代，头脑灵活的黄业江跟着舅舅跑运输，后来又转做物流中介，全家的日子还算富裕。然而，为办“村晚”，1998年以来，黄业江每年都有一个月的时间“不务正业”，且还要贴几千块钱，他与家人的矛盾也渐渐增多。

先是一年正月初二，老父亲被“气死”的儿子气到住院；没几年，妻子又因他放着自家生意不管，花尽积蓄买

“无用”的音响，身体和精神频出问题。

2003年是黄业江最困难的一年。

不顾妻子的阻挠，他还是固执地走出家门去排练。因为长期生闷气，妻子得了抑郁症，精神状态时好时坏。村里的干部还有乡亲都来劝他放弃，但他依然咬牙办完了当年的“村晚”。

那一年，黄业江“流着泪”办完了“村晚”之后，他带着妻子四处寻医问药，一个大男人，眼泪啪嗒啪嗒地掉。父亲和妹妹也都流着泪劝他放弃，“再这样下去，家还算是家吗？”

“那段时间真的是太难了！确实亏欠家人，尤其是妻子太多。”但黄业江说，自己就是爱好这个，不想放弃。

妻子生病那几年，村干部和很多热心村民，主动放下自家的活，到他家帮着做饭、打扫卫生，让他非常感动。

“如果说之前我在办‘村晚’感动了别人，那么那段时间大家对我的帮助又实实在在地感动了我，让我有了继续办‘村晚’的理由和动力。”黄业江说。

2005年以后，黄业江自办的“村晚”，名声越来越响，吸引了东海电视台、连云港电视台、江苏卫视、中央电视台等众多媒体的关注和报道，“村晚”越办越红火。

然而，闲言碎语仍不时传进黄业江的耳朵。

有人说：“他头脑是不是有问题，是不是神经病，为啥贴人贴钱干这个？家里人不同意，还跟家人闹意见。”

还有人怀疑，上级文化部门拨了专款给黄业江，所以他才这么卖力搞晚会，而且年年有搞。

对于这些，黄业江并不理会。“只要我还能动，我就要把黄川的‘村晚’一直办下去。不仅要办下去，而且还要争取一届比一届办得好。”

不只逗大家一乐

“你拍的那张照片真是太好了，照片里每个人都是笑脸。”每次见到好友张开虎，黄业江都会翻出一张多年前的照片，与好友一起分享、回味村民们看“村晚”时的那种欢乐。

“很多人问我，你办这个节目图的什么？我图的是大家的一个笑，一个乐。这个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黄业江说。

办“村晚”的20年间，黄业江坚持做到“三看”：

演出当天，要仔细看现场，舞台上的演员表演得开不开心、台下的观众是否看得开心；演出结束后，看拍摄的照片、看录制的视频，仔细分析哪些节目大家看了以后笑得最开心，为下一届“村晚”节目策划提供指导。

“大兵（黄业江小名）办的村晚，我一直在看，感觉一年比一年办得好。很多人当天吃完早饭就带着板凳赶去占座位。大家都很感谢他，希望他能继续办下去。”56岁的黄川村村民李祖霞原先是黄业江邻居，黄川村“村晚”，她一年都没错过。

63岁的夏德玉老人同样是黄业江“村晚”的“铁粉”。“以前村里春节期间没啥娱乐活动，基本都是打牌赌钱，自从办了村晚后，村里打牌的人少多了，村里也热闹了许多，过年的氛围更浓了。”

“能不能给我们家孙女弄个舞蹈跳跳？”“你看我家闺女能不能当主持人？”很多村民都以上黄业江的“村晚”为荣，经常找他要求上节目。

“谁说农村泥腿子搞不好文艺？只要坚持用心钻研，办晚

会咱也不比人家文化人差。”

回忆着20年为黄川村“村晚”的付出与坚持，黄业江觉得一点都不后悔。“能为家乡做点事情，让乡亲们开开心心，我就满足了，人活一世，总要有追求，不能只是一味赚钱。”

除了逗大家一乐之外，黄业江还将“村晚”视为吸引大家走出家门、一起聚聚，拉家常，增进感情的纽带。

“最近几年，中国发展很快，老百姓的钱包越来越鼓，人也越来越忙。但一方面村里的中老年人农闲时节比较空虚，需要丰富的文化生活；另一方面年轻人也可以借‘村晚’这个平台，春节期间走出家门，在一起多聚聚，联络感情。”

“土得掉渣”也自信

黄业江办“村晚”，很少请“外援”，主体演员大都是本地村民，即使有“外援”，也基本上是义务演出。

“我办‘村晚’，不为赚钱，更不是作秀，不能拿钱去请演员有偿演出，这样就变质了。”黄业江说，他需要的是真心热爱文艺的村民参与，这样“村晚”才能办得长久、接地气。

“给我钱还不参加呢，我就是冲着黄大兵你这个人来的。”连续十几年给黄业江“村晚”免费当主持人的朱崇君，是东海县某律师事务所主任，每年再忙都要抽时间给黄业江的“村晚”帮忙主持。

“在黄川村的春节联欢会上，凝结了太多人的智慧和汗水，大家不为名利，只为一个爱好。这样的开心、这样的乐趣，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在黄业江的坚持下，很多节目大都取材于身边的人和事，展示“土得掉渣”的内容，重在体现“农民也能演”的文化自信。

为办好2018年“村晚”，早在半个多月前，黄业江就已经放下手中的物流配送生意，开始筹划第二十届“小村春晚”了。目前他征集了20个节目，并按照主持组、舞蹈组、歌唱组等分别建立了不同的群，分类指导排练进度。

村民们也早就开始准备自编自演的节目。“小品节目不好说，表演不好会砸锅，临时换成三句半，等着看……”8日下午，记者来到黄川村村部门口，看到黄业江正在专注地指导着四五位小朋友表演“三句半”。

“今年我们准备了花船、相声、三句半、唱歌、跳舞、器乐等20几个节目，正式的节目单很快就能出来。”黄业江说，很多演员已经连续多年参加，表演依然热情不减。

53岁的本村村民张玉，已经连续十几年在黄业江的“村晚”上表演了。因为表情夸张、经常反串男性角色，她的小品总能引起大家捧腹大笑。今年她又自编了一个名为《刁媳悔改》的小品参演。

“小品里有婆婆、媳妇、儿子（丈夫）三个角色，我女扮男妆演儿子（丈夫）这个角色，主要表现在婆媳矛盾中，儿子（丈夫）受到的夹板气，目的还是引导大家正确处理好家庭关系。”张玉说，自从有了“村晚”，她感觉每年过春节又多了一种希望和期待。

“现在我们正抓紧排练，争取大年初一那天把最好的节目呈现给大家，让大家过一个欢乐的狗年春节。”黄业江兴奋地说。

（上接1版）他说，他放羊的亲弟弟曾在此被风雪围困，失去了8个脚趾，落下残疾。

“这样的事情太多了。”他向我摆摆手，不愿继续说下去。

那天晚上，赛山主动唱了一首歌：“在包扎得尔的冬天，我没有任何人可以倾诉，只有一颗心困在山上，流淌着泪水思念着你……”

后来，我才知道，巡诊前赛山母亲已然病重。这趟巡诊结束后的第11天，赛山的妈妈病逝了。那首歌，原来是这位宽厚的中年男子唱给妈妈的！

牧羊人之吻

新华社记者江文耀

进山第三天傍晚，在牧羊犬吠声中，巡诊医疗队抵达科克苏河北岸的阿克塔斯牧点。

骑马走近那幢山崖上的木屋时，61岁的老牧羊人阿贾克拜尔穿着整齐的灰色中山装，已等候多时。

叶力夏提赶忙勒缰，从马上一跃而下，一边用哈萨克语问候着，一边紧紧握住老人的手。

“让我亲亲你吧，我的医生！”望着比自己高出一个脑袋的叶力夏提，阿贾克拜尔难掩激动。

一个年近的男人竟想亲一亲另一个与他毫无血缘关系的人！假如没来这牧区，我一定理解不了牧民的举动。

牧民在陡峭的悬崖转场，在孤寂的山岭安家，在多狼的山谷牧羊，这样的生活练就了他们刚强的意志，却也侵蚀着他们的身板。

喜欢烫茶，少食蔬菜的饮食习惯对消化系统百害无益，数九寒天里溜冰溺水，牧民成了关节炎多发人群。牧区没有“坐月子”的条件，女人长期操劳，疾病缠身。

为确定拍摄点，我请叶力夏提给我指明行进路线。他找来一张纸，画出他独特的“上南下北”构图，画出条块分割的6个行政乡，再画达坂、河流、牧民转移点……

叶力夏提把包扎得尔全部装在了心里。

作为有4年“驾龄”的无人机机长，这次在牧区航拍的经历让我终生难忘。

无人机监视器里，医生们的身影时而渺小，在冰雪覆盖的达

“天使四人组”巡诊在遥远的冬牧场

坂上变成几个小小的黑点；时而伟岸，斜向而来的阳光将他们投射到地面的影子大大地拉长。

为解决牧民出行难题，县委县政府去年把进入包扎得尔的部分路段列入农村路网升级改造工程，近40公里山路将按四级公路标准进行建设，今年8月完工。

尽管道路正在拓宽，但大部分牧民的家远离交通要道，有的在山顶，有的在深沟，只有骑马才能抵达。

我和叶力夏提骑行在马队最前面。他对我说，重山环绕的冬牧场里，牧民生病了靠等、靠盼，熬不住了才请邻居送下山。每当想到山那头的期待，就恨不得把马赶得再快点。

每次出发前，他会灌满一塑料壶白酒，塞进马褡裢里“压身”。

“如果谁在达坂上害怕了，就喝上几口，把自己完全托付给马……”

“不管牧民住在哪条山沟，不管有多危险，只要牧民能走，我们就能走。”叶力夏提说这句话时像个英雄，“因为我们是守护牧民健康的最后一道防线！”

柔弱的“女汉子”

新华社记者毛咏

身材娇小的张红英44岁，是医疗队唯一的汉族女医生。军大衣穿在她身上，下摆几乎碰到脚背。上马还得同伴扶一把，不然就得找个大石头站上去，才能跨上马背。

冬季进山必须戴棉帽，张红英每次摘下帽子为病人听诊时，总是头发凌乱，加上又没穿白大褂，怎么看都不像个医生。

白天，山里木屋的采光全靠糊着塑料布的窗户和推开的门。张红英和正在输液的病人坐在光柱中，那情景更像两个女人在唠嗑。

我有些惊讶，张医生咋就那么厉害！看病也就罢了，打点滴从来都是一针准，干脆利落，手脚麻利。

我更佩服她产检的水平。一个听诊器，加一只在腹部探摸的手就能搞定。她是山里孕妇们的主心骨，有她在女人们就踏实。

10余年来，张红英亲手迎接的小生命已超过30个，这些哈萨克族孩子亲切地称她为“脐带妈妈”。

我终于明白了全科医生的含义，也发现了这弱小女人的强大。

但强大的“女汉子”也会倒下。

从进山开始，我俩就一直挨着睡在墙边。张红英每天给一房子人铺好褥子后才睡下。

她嘛我，用军大衣蒙着头睡，被冻醒的次数会少些。

进山的第三天夜里，险途的惊吓、骑马的疲惫、采访后的放松让所有人很快进入梦乡。

半夜时分，我隐约听见张红英喘息声急促异常，赶紧翻身呼唤。

手电筒光线下张红英脸色更显苍白，双目紧闭，汗水打湿的发梢粘在脸上。我大声喊着：“张医生醒醒！醒醒啊！”

“快喂她丹参滴丸！”

“快喊赛山医生来！”

屋里一片混乱，我无暇他顾，只管死死抱住张红英的内关穴，生怕一松手，就再也拉不回这个“女汉子”了。

终于，张红英嘴唇翕动，发出微弱的声音。

“好了好了，张医生醒过来了！”

高原缺氧？过度劳累？思念早逝的丈夫？张红英没想明白自己是怎么倒下的。天亮后，她没要求任何特殊关照，照样跨上马背，开始新一天的奔波。

不能说的秘密

新华社记者滕沐颖

进山第五天，在海拔3580米的阔克乔克达坂顶部，阿

斯哈提赶上马山坡，没想到，马儿突然打了个趔趄。

阿斯哈提失去平衡，从马背跌落，一只脚卡在马镫里。

在一阵惊呼声中，阿斯哈提死拽住缰绳，终于拔出脚，就地躺在坡上。

“他走得太急了……他的马第一次上山……还好这儿坡缓……”同事们为他感到后怕。

半小时前，大家牵马向陡峭的冰达坂“冲刺”，阿斯哈提与赛山一溜小跑，把所有人甩到后面。

阿斯哈提这一摔吓得我不敢骑马了，手脚并用，才爬过了山尖最后100多米碎石坡。

翻过达坂，我仍在恐惧之中，直到傍晚钻进牧民家的木屋，眼泪才抑制不住地滴下。

在迟到的眼泪里，有死里逃生的后怕，有对自己懦弱的羞愧，有对这群医生的心疼。

这样的路，我再也不想走第二回了！

阿斯哈提安慰我：“小滕，咱们把最难的路走完了，接下来都是小坡儿。”

他和我一样也是90后，今年27岁，毕业后先在县城计划生育指导站工作，2015年考入牧区卫生院，今年是他第三次冬季巡诊。

“第一次进山很害怕，马道又窄又滑，一个不小心，人和马可能就都没了。”他说，“然后，就习惯了。”

阿斯哈提对我说自己也曾后悔过，那是在刚到只有8个人的牧区卫生院时，在途经“搓板路”赶往卫生室时，在包扎得尔翻越山尖时……

“但一看到牧民澄澈又渴望的眼睛，就感觉一切都值。”

相貌英俊的阿斯哈提新婚不久，但他从未向妻子透露自己的工作环境，也从没把包扎得尔的崇山峻岭拍入手机。每当妻子问起，他都淡定地说：“不要听别人瞎说，现在路修得好得很，没有不安全的地方。”

这次为期10天的巡诊，医生们诊治了300多人，发放了近600盒（瓶）50种类别的药品。叶力夏提告诉我们，过去10年，巡诊队诊治的牧区患者已超过2万人次。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2月11日电